

筚路蓝缕 留学先驱

——中国留学之父容闳



容闳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香山县南屏村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道光十五年（1835），入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学校读书。二十年（1840），入马礼逊学堂。^①二十七年（1847），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Samual Robbins R. Brown）赴美，就读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三十年（1850），考入耶鲁大学。三十二年（1852），入籍美国。咸丰四年（1854），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11月回国。咸丰五年（1855），先后任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伯驾（Hon. peter parker）的秘书、香港高等审判厅通译、上海海关等职。后进宝顺洋行经营丝茶。十年（1860），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未被采纳。同治二年（1863），应曾国藩邀请，往安庆任“出洋委员”，授五品军功衔，

① 马礼逊学堂为西人在中国所办的第一所西式小学。罗伯特·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1807年来华，是英国第一位入华传教士，他中译《圣经》，编纂《华英字典》，创办英华书院，1834年卒于中国。次年，在华英、美人士为纪念他传教的开路之功，拟以其名创办学校。1836年英商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颠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从英、美募资，每月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温施蒂（wanstall）提供15英磅的资助，在其主办的女子私立学校中附设男塾，作为马礼逊学校的预备。1839年11月4日，温施蒂关闭女子私立学校及男塾，同邀来的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半岛沙梨头附近创办“马礼逊学堂”，传播基督教，由布朗任校长。最初招收6名学生，学制三至四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堂和英华书院迁往香港，分别由美国新教教士布朗（Smuel Robbins Brown）和英国教士理雅各主持。规模不断扩大，课程日趋正规。容闳、黄胜、黄宽、唐杰等许多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技术人才曾入读该校。1849年停办。



赴美国为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四年（1865），携所购一百数十种机器归国，授五品候补同知，任江苏布政司衙门翻译。六年（1867）向曾国藩提议在江南制造总局旁设立兵工学校获允。6月，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草拟《联设轮船公司章程》。同治七年（1868），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遂向丁日昌呈递设立轮船局、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等“四则条陈”，未被采纳。同治九年（1870），协助处理“天津教案”，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教育计划，得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接纳并联名上奏。次年选派幼童留美计划获准，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从陈兰彬主持上海留洋预备学校。十一年（1872），先行赴美国为首批留学幼童安排衣食住行。任中国驻美“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十二年（1873），赴秘鲁调查美洲华工实况。十三年（1874），与香山同乡叶廷眷、唐廷枢、郑观应等创办《汇报》，为上海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华文报纸。光绪元年（1875），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是年2月24日，与美国女子玛丽·凯洛格（Mary Kellogg）成婚。二年（1876），受耶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四年（1878），为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捐赠1237卷中国典籍。七年（1881）年，清政府撤销“幼童出洋肄业局”，旋回国销差。八年（1882）因妻病，返美。十二年（1886），妻子凯洛格病逝。二十一年（1895），应张之洞邀请回国，建议实施“新政策”。受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为江南交涉员。二十三年（1897），赴北京提出建立国家银行、铁路建设等建议。二十四年（1898）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六年（1900）春，在香港会见兴中会首脑杨衢云、谢纘泰，讨论政局，密商合作；7月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称“中国国会”，被公举为会长，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遭清政府通缉，与孙中山同船逃往日本，后避居香港。二十八年（1902）赴美定居，与先后游历美国的梁启超、康有为保持密切联系。三十四年（1908），与布思会商，制订关于在中国的行动计划。宣统元年（1909），邀孙中山赴美商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谋划“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 - China）。是年，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出版。^①

① 该书国内计有5种中译本：1915年，徐凤石、恽铁樵合译（节译）的《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81年，钟叔河等据1915年版和英文原本修订重版，添加自序及附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湖南岳麓书社据各刊本加以校订，新编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后再版，仍名《西学东渐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1991年，王蓁据英文版重译，中华书局出版，取名《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1998年，沈潜、杨增麟据1915年版，附译注，取名《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西学东渐记》，收入《醒狮丛书》，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石霓据英文版译成白话文，附译注，取名《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出版。

民国元年（1912）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葬于哈特福德市西郊雪松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

梦圆耶鲁 先鞭洋务

鸦片战争犹如一场噩梦——欧洲列强于“一夜之间”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华夏大地面临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①。这场战争也犹如一服清醒剂，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和视野，朝野上下，自朝廷大员到下层知识分子逐渐从“天朝大国”的沉梦中惺忪过来，开始意识危机，探讨应对时局的方略。“开眼看世界”者，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先驱，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踏上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漫漫之路。

生逢“盛世”、长于忧患的人，特别励志。鸦片战争前5年，正值容闳上学的年龄。父亲容丙炎从友人那里得知，澳门马礼逊学堂预备成立，洋学堂招收男童，不收学费，提供住宿，便托熟人将儿子送往澳门念洋书。容闳后来揣摩父亲当年的心态：“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②容闳就读的洋学堂就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温施蒂开办的学校，他年纪最小，淘气中透出几分聪明伶俐，深得郭氏喜爱。于无忧无虑之中，容闳入蒙英语和西学知识。

好景不常。及至鸦片战争前夕，洋学堂停办，容闳辍学回家。第二年，父亲不幸逝世，为了生计，容闳卖糖果、拾稻穗，入传教士开办的印刷所做“折页”童工。

^①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另，下文多引用此书。



1839 年底，马礼逊学堂正式创办，校长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布朗。郭夫人离开澳门之前，曾恳请布朗复校后务必招收容闳。次年 11 月，容闳重入马礼逊学堂。学堂采行中英文双语教育，教师除布朗夫妇外，还聘有一位本地私塾先生。上午授英语，下午习中文。英文课程有历史、天文、算术、代数、几何、力学、化学、伦理学、地理、音乐、美术以及《圣经》讲解，中文即讲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等。布朗先生教育经验丰富，深受学生爱戴，容闳回忆说：“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的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需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

真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转眼几年过去，布朗夫妇因身体不适必须回国，临行前，询问是否有学生愿意随同赴美继续学业，容闳和黄胜、黄宽兄弟当即报名。容闳回忆说：“1846 年冬，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布朗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时际国门初开，出洋留学，纯属新鲜，又是冒险。容闳毅然走出桑梓，充当留学先锋，他征服了多少偏见与感情的纠葛，不言而喻矣。

1847 年 1 月 4 日，容闳与黄宽、黄胜随从布朗夫妇搭乘美国奥利芬洋行（The Olyphant Brothers Co.）“亨特利思”号（Huntress）商船启程，漂洋过海，历时近 3 个半月，抵纽约港。三人在布朗夫妇的家乡住了一个星期，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孟松是美国有名的预备学校，校长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毕业于耶鲁大学，“德高望重，品学兼优”，“夙好古文，兼嗜英国文艺，故胸怀超逸，气宇宽宏”。校长对远蹈重洋求学的中国少年爱护有加。容闳在孟松求学，深为西方教育所吸引，

决定在美国攻读大学。

1848年，容闳报考耶鲁大学。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能入第一流大学深造，并计划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设置的奖学金，但该奖学金要求签订保证书，毕业后以传教为职业。容闳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心境很坦然：感激校董的热诚，“而予之对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容闳留美深造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发力。

1850年，容闳入读耶鲁大学。由于仅仅得到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协会的资助，经济负担吃力。作为该校建校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孤身异邦，孤寂难耐。入大学前，他只在孟松学习一年，与本土学生的水平相较处于劣势，不得不通过勤奋来弥补，几乎每天读书到深夜：“余之入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划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一年级，容闳担心数学成绩差会留级，因英语作文经常在全校比赛得一等奖，平均分数仍处于中上。三年级开始，容闳经济上得到新的资助，又在校内谋到几个临工职位，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功课也赶了上来，各门成绩都有提高，“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而中国国籍，“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1854年夏，容闳在耶鲁修完大学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流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从青少年时代起，遨游西学，依然关注祖国的命运，“常思藉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耶鲁四年，他的思想逐渐成熟。面对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落差，不禁感叹：“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迫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既受教育，则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



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

站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前沿审视封建社会的弊端，容闳与国内仅知西方“皮毛”的经世派和洋务派相比，更能感悟西方文明的冲击，体会到中国必须有一大批人游学或游历欧美，通过体验西方文明的熏陶，才能获致解救中国的机理：“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怀。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救国”计划由此形成。

1854年，容闳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怀着实践“教育救国”愿望，回到了故园。先是花了半年恢复汉语口语，接着担任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伯驾的秘书，希望藉此认识朝廷高官，推介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但伯驾对容闳的计划缺乏兴趣，也接触不到高层。三个月后，容闳辞职赴香港，任高等审判厅通译，试图学习法律，做开业律师，但为英籍律师所排斥。转赴上海任海关翻译，待遇还不错，而英国人把持权柄，难享有平等的升迁：“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容闳再次选择了辞职。“屡战”失利，并没有动摇容闳实现留学教育计划的决心。他想到了经商，赚了钱便可以实现教育计划，于是进上海宝顺洋行经营茶叶生意。

1860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造访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洪仁玕时任天国干王，总理朝政。容闳向他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及聘用人才为顾问、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颁定教育制度、设立实业学校等七条建议，希望自己的救国方略付诸实践。洪仁玕认同容闳的建议，奈何太平天国时危机重重，乏力施行。容闳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表示俟建议实施再来效力。太平

天国之旅让容闳终身难忘，直到暮年他还思考太平天国的问题，并在《西学东渐记》里专辟一章《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之观感》作追忆和反思。容闳认为太平天国的爆发是由朝政腐败而起，其失败则因纪律松弛和道德堕落，农民革命难以解救民族的危机。晚年他曾追忆道：“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

几经考虑，容闳选择了曾国藩作为实现宏愿的寄托。曾国藩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由封建官僚转化而来，善经世致用之学，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较早使用新式武器，聘请外国人“助剿”，对西方军事器械认识较深，罗致技术人才，走上了自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求强致富之途。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军械所，为了扩大和完善该厂的体系，准备采买一批能够完成机械加工的西洋机器。办理“洋务”最急切需要的是人才，当他听说容闳在美国生活八年、精通英语和西方科学技术之后，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适合不过的人才，决定以礼相邀。这也正好与容闳期望曾国藩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不谋而合。

1862年7月，容闳应邀至安庆大营访问曾国藩。次年9月，曾国藩再次邀请容闳会谈，询问“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先设立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制器之器”无疑超出了洋务派当时的思想，曾国藩深受启发，认识到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重要性。随后，曾国藩奏授容闳五品军功，委任容闳赴美采买“制器之器”，筹建兵工厂。

1865年春，容闳携所购一百数十种机器归国。回到上海时，曾国藩已调至徐州负责“剿捻”。因此，这批机器被并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筹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从李鸿章在



上海成立的上海炮局继承而来，二是李鸿章购买的上海虹口洋人机器厂的旧机器，三是容闳采购的这批机器。三者相比，容闳购买的最为先进。由于有了容闳购自美国的这批机器，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好望角以东最大最现代化的制造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军工企业，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容闳采买机器成功归来，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大员的信任和赏识，曾国藩专折上奏：“花翎运同銜容闳，熟习东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合行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①不久，容闳就授任五品实官，协助上海道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总局，这为之后容闳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做了铺垫。

1867年，容闳草拟了“组织汽船公司”、“派遣留学”、“开采矿产”和“禁止教会干涉词讼”等四项条陈，托丁日昌代奏朝廷。其中“组织汽船公司”对李鸿章组建轮船招商局影响颇大，轮船招商局的章程中，就可以发现很多与容闳所拟条陈相近之处。“开采矿产”对洋务派的影响更不用细言。“禁止教会干涉词讼”则体现了容闳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先知，这也是他与其他洋务派人物不同之处。

容闳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最大、成果最硕，也最能体现其思想特色的莫过于“幼童留美”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械层面，曾国藩邀请容闳加入洋务运动，就是因为他熟悉欧美工业发展状况，对采购西方器械极为便利。容闳获得洋务派的信任，有机会向政府提出“教育救国”计划。同治六年（1867），他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被批准实行。这是容闳计划的第一步，让心中的教育计划烧起了希望。次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内有“中国人美国的大小官学，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的条款。这种在教育交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也为容闳向美派遣留

^① 《曾文正公保举容闳折》，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载台湾《书目季刊》，1979年9月号。

学生计划开了绿灯。但是，他通过丁日昌上奏的“条陈四则”（含“派遣留学”计划），却石沉大海。

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容闳充任经办此案的李鸿章、曾国藩的翻译，有机会向二人提出幼童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和丁日昌等也意识到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于是联名向朝廷会奏。是年冬，“幼童留美”计划被准奏。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次年两人着手操办筹备留学事宜：创设留学预备学校，遴选合适幼童，经过一年基础学习，赴美留学。1872年7月，容闳先期赴美为首批留学幼童安排衣食住行和就读学校。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由陈兰彬带领离沪赴美。自1872到1875年分4批共120名学童赴美留学。

幼童们抵美后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他们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所就读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幼童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过美国式的生活。渐渐地，他们不愿成为美国的另类，常常是一身美式打扮，甚至剪掉辫子，信奉基督教，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清朝礼节不大遵守。针对幼童的变化，容闳认为这是融入美国社会，学习西方知识的必要，无须太多介意，但这些新变化却被清朝的官员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因此，在“出洋肄业局”内部乃至清廷内部，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争论和冲突不可避免了。

1875年，陈兰彬、容闳分别任中国驻美正副公使，容闳兼管留学生事务。其间，思想的冲突加剧，到1881年，“幼童出洋肄业局”撤销，全部学生被召回国，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留学大计终止。

当时，在入读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撤回，仍留在耶鲁继续大学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先被召回，再回美国，读完了耶鲁。回国的“幼童”参与了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的建设。一部分人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为国捐躯。20世纪初年，他们有的成为朝廷的重臣，辅佐朝政；有的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等新兴产业；有的涉足外交领域，代表大清国，为维护祖国和民族的尊荣作贡献。尽管，容闳所倡导的中国早期留学运动夭折于半途，其历史功效却没有就此终结：



“容闳与留美幼童开拓了近代中国留学的先河，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造就了一批强国栋梁。”^①

中国人出洋的历史久矣，鸦片战争以后，始见规模。1860 年中英《北京条约》显示了华工可“自由出洋”的字样，为列强掠夺华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是，西方列强无比热心解读“条约”，大张旗鼓地在各通商口岸及香港、澳门等地以招工为名掳掠拐骗劳工。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1869 年至 1871 年，总理衙门多次接到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诉苦求援秉文，但苦于没有驻外机构，只得请求美国驻秘鲁大使，代为援助。其后，“玛耶西”号事件让海外华工受虐情形不断曝光，秘鲁成为世界舆论众矢之的；澳门苦力贸易即将中止，秘鲁招工须另寻出路。于是，秘鲁向中国派遣使臣，劝说中国政府签订一项输出华工条约，但清政府并不想与秘鲁缔结条约。清政府认为，澳门苦力贸易的禁止指日可待，像秘鲁这样一个依赖苦力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国家，一旦华工来源被切断，就会面临危机。中国根本没有必要与虐待华工的秘鲁就有关移民条约举行谈判。1872 年中秘两国谈判过程中，秘国特使狡辩否认拐卖、虐待华工，李鸿章坚持秘鲁遣回全部华工方可商订条约，两国谈判陷入僵局。

1873 年，李鸿章推荐容闳“密往秘鲁查访华工情形”，称“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陈兰彬）之颠扑不破，但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详情既熟，必敢与若辈齟齬争论，其志趣尚知要好，以粤人查办同乡之受苦者，断不至嗫嚅漠淦致令华人吃亏，是乃用其所长之意。”^② 容闳到达秘鲁首都利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选录了十多名华工的呈词和供词，并利用最新的摄影器材拍摄了二十四张华工受虐惨状的相片，加上美国驻秘鲁公使提供的材料，转寄给总理衙门，为中秘谈判提供了确切证据，使秘鲁特使不得不承认迫害华工的事实，并照会保证“实力保护”华工。容闳不辞辛劳，调查秘鲁华工受虐事件，为保护华工作出了贡献，得到

^① 王杰：《“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李鸿章：《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李鸿章全集》卷二，译署函稿，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26 页。

清政府的嘉奖：“又查有三品同知容闳，于密查秘国华工之役，能殚心竭力，不辞劳瘁，亦应酌予奖励，并据李鸿章称，容闳孰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备出使之选。”^①

1875年，容闳被任命为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副钦差大臣。容闳在1875年至1881年担任副使期间，正是美国种族主义掀起排华浪潮，华人处境日益恶化，外交工作十分艰难。容闳到任就因美国旧金山税务局歧视华侨烟草商而出面与美国政府交涉，使得美国联邦税务局保证恢复旧制度，指示旧金山税务局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新规定。其后，容闳在1879年和1880年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要求美国政府正视排华的严重性，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华侨的权益和安全。

条陈新政 鼎力维新

1881年，容闳出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副使的任期结束，“幼童出洋肄业局”被撤销，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流产，心境比较低沉。他在国内待了两年后，于1883年回到美国与妻儿团聚。约在1887年新年期间，容闳用毛笔抄录了一首抒发心境的诗：“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可见，容闳备受挫折，情绪显见低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激起了容闳的爱国心。容闳通过旧同僚蔡锡勇向张之洞提出：“速向英国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舰）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和“一面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张之洞接受了第一个建议，并令容闳自美赴英与英国银行谈判。由于李鸿章执意主和，容闳此项提议亦无法践行。

1895年，容闳受邀回国，乃向张之洞提出：“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此外更派年轻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

^①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9页。



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容闳的“新政策”把欧美的政治制度嫁接于清政府，通过政府的革新和自强来挽救危局。但是张之洞认为建议“太新太激烈”而不能接受，对容闳也逐渐冷淡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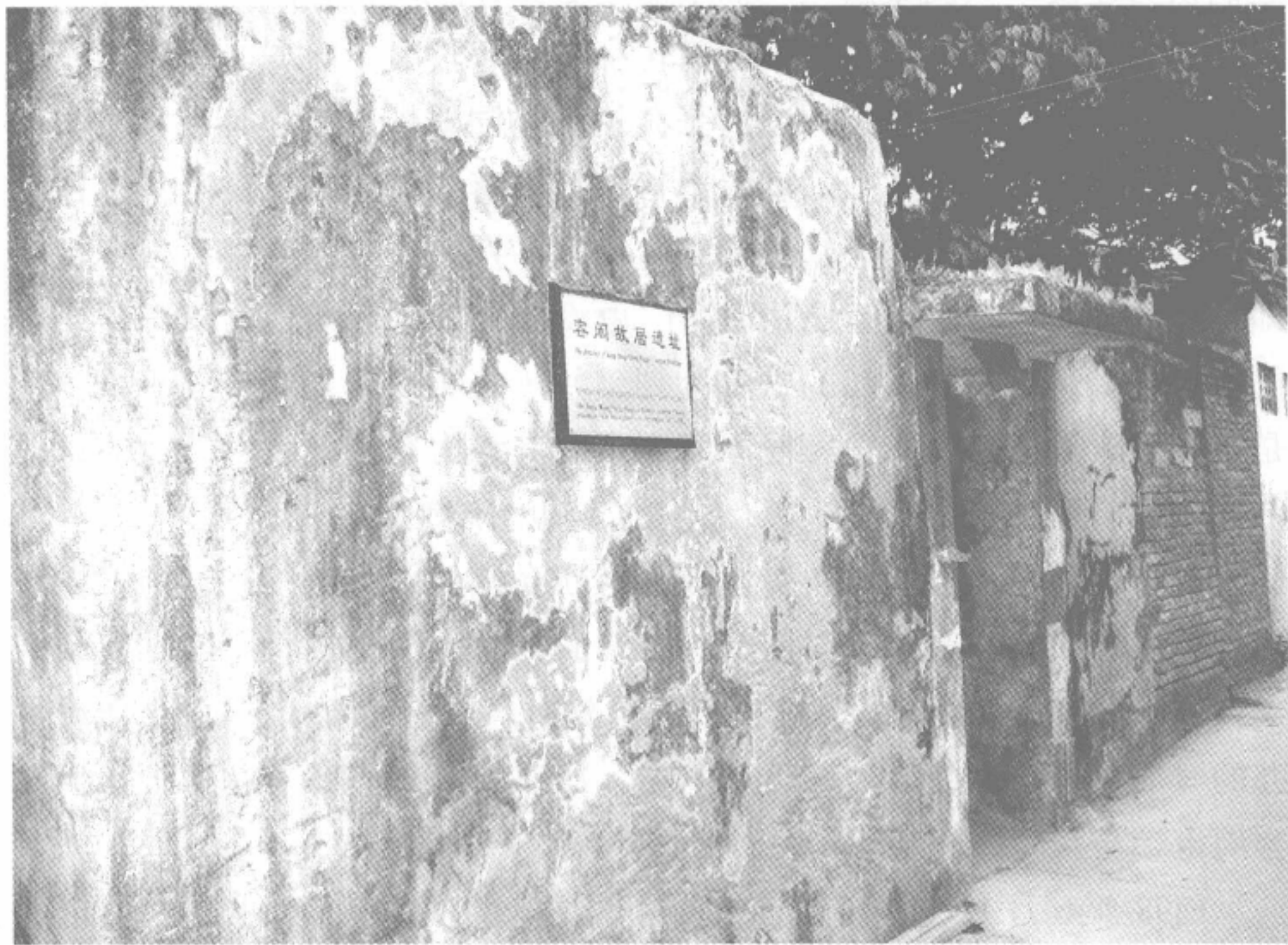
在呼吁政治改革受挫后，容闳转身于实业救国。1896年，容闳设想一个创办国家银行的方案，通过张荫桓和翁同龢提交京中各部大员。但盛宣怀从中作梗，创办中国现代银行的计划落空。容闳又提出营造铁路的计划，建议向国外出让修筑铁路的权利，换取借款，到立约规定年限即可把铁路权利收回。但是总理衙门也没有批准这个计划。1897年，容闳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计划，并于次年得到光绪帝的批准。但是这条铁路需经过山东，而德国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故竭力反对，加上张之洞以及总理衙门的反对，铁路计划也告胎死腹中。

于容闳呼吁政治改革和实业救国不断受挫的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逐渐走向前台。容闳的实业救国主张得到了维新派的支持，《创办银行章程》、《续拟银行条陈》、《铁路条陈》均在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1898年4月，康有为和李盛铎发起“保国会”，容闳也参与其中。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下，颁布了“明定国是”的上谕，宣布实行变法。容闳的住所成了维新派人士的秘密集会地。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位数十年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同乡前辈十分敬重，视为“智囊”，每遇重大问题，即往容闳住处讨教。容闳几乎关注了康、梁维新派所有重大活动的策划，并希望影响这场运动的方向。“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的一系列的变法诏书，其主要内容与容闳40多年的追求和实践大同小异。政变前后，容闳利用美国公民的身份，寻求美国和日本的保护，参与营救维新人士，事后自己也被撤职，逃往上海租界避难。

在上海租界，容闳与在沪的维新人士唐才常、汪康年、经元善、叶瀚、张通典等人交往颇多，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保持着联络。1899年，容闳潜赴香港，经容星桥引荐，与杨衢云、谢纘泰、何启等人相识、激扬时事。香港之行，容闳渐由支持维新变法转向扶助革命党。当他得知兴中会和保皇党人均准备联手发动武装反清起义时，表示极力

的支持。其时，两派谋求合作，并有了初步的协议，为了弥合各党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各方拟请容闳出任维新党派联合体的主席。



容闳故居（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西大街三巷一号）

1900年春，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邱菽园、丘逢甲共商起兵勤王。而后，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唐才常等在上海秘密组织武装，北上“勤王”。容闳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密议成立“中国国会”，各省在沪名流纷纷响应。7月26日，“中国国会”在愚园成立。容闳、严复、叶瀚、章太炎、文廷式、唐才常、沈荇、张通典等出席了会议。叶瀚任大会主席，宣布了“联会之意”，（1）不认通匪矫造之伪政府；（2）联络外交；（3）平内乱；（4）保全中国自主；（5）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为“中国国会”。公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3天后，第二次集会，确定“国会”宗旨：（1）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2）力图更新日进文明；（3）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4）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矫造之伪命。容闳在《中国国



会自立军勤王讨贼》的基础上起草了英文对外文告。

“中国国会”成立后，唐才常组织的各地自立军统一受其节制，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推翻清政府，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8月，张之洞破获汉口自立军机关，唐才常等被捕就义，“中国国会”风流云散。

先是，自立军准备起事的消息传到日本，孙中山想借机回国联络革命力量。抵达上海时，自立军起义经已流产。孙中山在上海日本轮船上停留两天，会晤了从汉口潜逃来沪的容星桥，并约定与容闳一起逃难。9月，容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潜往日本，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次邂逅，容闳对孙中山加深了认识，认为革命派才是中国的希望。之后，彼此联系渐趋密切。1902年，容闳离港赴美，直至逝世。

心系救国 鞠躬尽瘁

容闳离港赴美前夕，兴中会员谢纘泰嘱托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争取美国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居美期间，容闳心系祖国，言与行俱，保持与革命派和维新派的联系，期望两派联合，以壮大反清阵营。

1903年春，梁启超游历美洲新大陆，创设保皇党美洲支部，专程到哈特福德拜访容闳。容闳出席了梁启超的演讲会，陪同参观耶鲁大学，引荐留在美国的“幼童”，并引见美国军事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人士布思（Charles B. Boothe），商议训练华侨军队事宜。经过几次密谈，梁启超任命荷马·李为“中国维新军”总司令。1905年康有为赴美游历，检阅了“中国维新军”，特意拜访容闳。容闳不顾年迈体衰，极力劝说荷马·李和布思继续为维新派筹款和训练军队。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国内形势发展迅速，革命党活动的重心逐渐由海外转回国内，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主张得到传播和认同，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立场，与孙中山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容闳认为康有为实际行动少，又将美国华侨捐献的款项私用，是“自己伤害、嘲弄自己”，容闳开始疏离保皇党，倾向革命派。

1907年，容闳与谢纘泰联系增加，提出了一套促进中国革命成功的方案。1908年10月10日，容闳与布思制订了关于中国行动的计划，布

思还介绍退休的纽约银行家阿伦（W. W. Aleen）参与。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在容闳的影响下，荷马·李和布思开始疏离保皇党，并按照容闳的设想编练推翻清政府的“中美联军”。容闳连续致函荷马·李，敦促其到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如果能占领一个省，可委任其为总督。建议荷马·李担任联合军总司令，还寄去一份中国各秘密会社的名单，其中有“革命党孙文”。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职。18日，容闳与阿伦会晤，认为袁世凯还会东山再起，可以利用他控制北洋新军将领；同时表示对康有为不满；认为孙中山是所有中国革命人士中最可信任的，他在广东有强大的势力，应该赞助他实现理想和计划。容闳提出需要五百万美元、十万支枪、一亿发子弹，用以帮助孙中山革命。该计划命名为“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 - China）。容闳也开始频繁写信邀请孙中山赴美国具体磋商。

1910年2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与容闳函件商议：拟向美国银行借贷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人士管理光复省区城市；任用一位有能力人士统率军队；组织训练海军。3月，容闳致函荷马·李，转达了孙中山的要求。通过容闳的函介，孙中山与荷马里、布思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市（North Long Beach）三次密谈，商洽筹款练军等事宜。

“中国红龙计划”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党应改变策略，暂停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小型起义，保存实力，集中人力物力，充分准备谋划，再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由孙中山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委任布思为“海外财务代办”，负责与纽约的各大财团接洽贷款事宜，同时由孙中山准备一份中国国内各省革命代表签署的文件，作为贷款的依据；把在美国接受过军训的中国军官遣派回国，以充实国内的革命武装力量；武装起义贷款总额为350万美元，分四次支付。

红龙计划的核心是募集资金，在中国南部举兵反清。但是筹款困难重重，美国银行家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感兴趣，不愿投资。布思以“中国同盟会海外财务代理人”身份数次向摩根公司提出贷款请求，都毫无结果。布思和荷马·李与纽约财团商谈借款亦失败。“中国红龙计划”



初期，孙中山和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都对此充满信心，极力支持，国内的小规模起义暂停，黄兴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但是筹款一再失利，同盟会领导人也逐渐淡化了向美国贷款的希望。容闳在“中国红龙计划”制订不久便病倒，无力过问计划实施情况。筹款无着，孙中山给容闳写信，希望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中国做些什么。容闳此时已经在病榻一年多，不能会见孙中山，于是写信邀请孙中山来哈特福德商谈。孙中山无暇会晤容闳，只是告诉与之联系的地址。

“中国红龙计划”最终搁浅，革命党人即开始了新一轮的武装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发成功，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各省独立运动汹涌澎湃。清朝政府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一面镇压反清起义，一面与革命党人议和，以谋取更大利益。迫于军事压力和列强的干涉，革命党人接受了议和。12月，议和代表联合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虚临时总统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达成停战协议。18日，南北议



晚年容闳在美国寓所

和全权代表在上海和平谈判。容闳在病榻上，通过报纸和友人的来函获悉首义成功和南北议和的信息，致函革命党人道：

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下求饶。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藉。现在，你们已经把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像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他们会对你们说：君主立宪和你们国家的过去情况更为一致，和你们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协调；有了君主立宪，同时设立一个枢密院，由袁

世凯这样的人当内阁总理来领导它，这样，保证你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一切可靠的希望。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1898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吗？他是最受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他想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你们就对了。但是，在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密团结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我无需向你们描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悲惨后果。你们自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本来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想想你们的革命给你们和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

在辉煌胜利的背后洞察潜伏的危机，于战争尘埃未落定之前指出中国革命前行的方向，容闳的判断几乎切中了中国革命的现实。这不仅表明容闳关注、研究祖国政治走向的热忱，而且表明这位83岁高龄、体弱多病的容闳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他所揭示袁世凯的奸险、革命党人的争夺以及列强的干预等三个因素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像容闳这样在晚年保持对进步事业的热情与敏锐眼光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罕见。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集资金，获悉起义成功，并未匆忙回国，而是往欧洲筹款和争取国际支持。12月25日，孙中山返抵上海，着手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容闳得知消息后，非常振奋。他致函老朋友谢纘泰，请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并代向孙中山表示“衷心的



祝贺”。还说他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在逝世前一月致友人的信中，还表示要为编纂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尽心竭力。对革命的忠诚、对共和国的热爱浸透这一时期容闳的所有书信。革命党人没有忘记大洋彼岸这位“本党老同志”。早在1899年，孙中山就曾有过推举容闳为中国资产阶级各派联合组织总会长的提议，认为容闳是中国“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郑重致函容闳，请他归国担任要职，信中写道：



容闳晚年在美国

容闳老先生伟鉴：当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达之目的将达之际，遯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之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已也，即仆等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今已二百六十余年矣，而教育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平等自由之说，得勿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福，悉自先生所赐矣。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谅亦不致掉头而弃我也。

1912年4月21日，容闳逝世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是祖国的前程，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纽约时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他们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容闳的生命跨度几乎覆盖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他目睹或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宪政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触的人物，从传教士到农民起义领袖，从清朝洋务大员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领袖，如郭士立、布朗、理雅各、罗孝全、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洪仁玕、王韬、李善兰、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谢纘泰、孙中山等风云人物皆与容闳有过往来。作为一位实干活动家，他“做的”要比“想的”、“提倡的”多得多，不愧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以救国为己任，谋求中国社会的革新，以开创留学教育之先河为最突出。

美国耶鲁大学，名人堂，悬挂着这位中国人的肖像；中华世纪坛，名人廊，镌刻着这个与世长存的名字。半个世纪前，值容闳于耶鲁大学毕业100周年纪念，母校为他举办纪念会。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容闳居住过的哈特福德市宣布，设立容闳留学基金，资助500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容闳，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纽约至今保留着以容闳命名的公立学校。